

绪 论

在古代中国,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帝国中心与边缘社会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两种关系。此两种关系的发展、演变直接作用并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因此,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宏观掌握一个时代的发展脉络,认识与了解历史行进的内在动力及其轨迹。

具体到秦汉时期,这两种关系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亦是显而易见的。以往学界在对两种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最明显的不足便是由于研究模式与研究视角的单调,过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华夏”中心的角度来看待、分析此两种关系,其展现的是“华夏”眼中的中原王朝(华夏政权)与周边民族,华夏中心与边缘社会互动的历史。这种历史往往被简化为“华夏”中心单方面地去影响周边民族与边缘社会,而后两者则“被动”地接受前者之影响,或可称之为少数民族汉化史或边疆开发史。此种研究理路显然忽略了华夏边缘族群的主体性及其与华夏中心互动过程中精神认同层面的变化情况,未能很好认识到作为华夏世界的“他者”,华夏边缘族群也是有“历史”、有“思想”、有“感受”的。受其影响,以往的相关研究也并不能够全方位地反映上述两种关系演变的内在脉络。

基于以上这些认识,出于对以往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一种补充与修正,本书尝试以华夏边缘主位为视角,考察边缘族群如何在与他者的互动中确立、建构自身的族群身份与认同,以处理同华夏政权或华夏“中心”之间的关系,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秦汉族群互动的历史,以期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两种关系及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

一、研究现状与问题所在

1. 研究现状

一个多世纪以来,秦汉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关秦汉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也异常繁荣。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且不论涉及秦汉时期的各种民族通史性著作,即使是通论秦汉民族或专论当时某一民族的论著便已是不计其数、举不胜举;在边疆史方面,秦汉政府对边疆的开发长久以来一直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论题,而政治制度史、经济史、区域文化史研究中也多会牵扯到边疆地域,加上百年来秦汉边疆地区大量简牍的出土,更直接推动了边疆史的研究。在这里,本书无意对百余年来秦汉民族史、边疆史研究进行总结评说。因为多数已出成果与本书所要探讨的秦汉华夏边缘族群的身份与认同并无多大关联。此处仅列举与本书论题有关或对本书研究有过启发意义的论著。

以往有关秦汉民族(族群)的民族(族群)意识、民族(族群)认同、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等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汉人、中原、华夏社会的考察上。此类研究或认为西汉初期对匈奴的战争及汉朝在汉匈关系中的“卑下”地位促发了汉民族意识的生

成,其代表著作有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①、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等^②;或主张伴随秦汉王朝的建立,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有着很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同一性与包容性。其较为典型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人不存在狭义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观念,他们只将民族与国家视作文化的机体,他们彼此之间似乎没有一种很清楚的民族界限。^③李禹阶先生《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指出,“华夏民族与国家的演进和互动走着一条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古代中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一性传统及民族意识中的民族与国家认同相一致的深层价值结构”^④。

其他关涉到周边民族(族群)的认同或从夏夷互动的角度探讨族群意识、他者意识的论著主要有:李静、陈丽《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一文指出伴随汉匈关系的变动,匈奴族的民族意识亦呈阶段性变化。^⑤崔明德先生《略论两汉时期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集中对匈奴单于希望在政

① 宋超:《汉匈战争对两汉社会心态的影响》,《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② 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61-288页。

③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44页。

④ 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⑤ 李静、李丽:《从汉匈关系的角度探讨汉匈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变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治地位上平等甚至高于汉朝的“自尊”意识进行了探讨。^①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下引相关著作认为汉代羌人分散而居，彼此独立、相互仇杀，其不可能也并未形成强烈的族群自我认同。与其相反，常倩《论两汉时期羌人的凝聚》则主张汉代羌人逐渐形成了极强的凝聚力，且在东汉产生了强烈的族群认同。^②史党社先生的博士论文《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在引进西方族群理论并加以发挥的基础上，考察分析了“秦人”这一特定群体在与“华夏”、“戎狄”等族群的互动中被“秦人”上层主观“建构”的过程。^③他认为共同的祖先及历史传说、文化、姓氏、地理是秦人在建构自我族群的时候用来作为族群象征、边界标志的因素。秦人利用这些因素，限定、区分、建构了“秦人”族群。对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人群，秦人可用不同的边界来调整自我认同，选择排斥或接纳他们。^④方素梅先生《中国民族思想史上的他者意识及其变化》一文分析了中国民族思想史上的他者意识及其影响与变化。她指出：“他者的涵盖非常广，既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异类群体和文化，也可能只不过是被人构建出来的他者。”其认为在中国民族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自者努力将他者异类化、他者努力向自者靠近的双向运动。^⑤许倬云

① 崔明德：《略论两汉时期匈奴首领的“自尊”意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常倩：《论两汉时期羌人的凝聚》，《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

③ 史党社：《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复旦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④ 史党社：《秦关北望——秦与“戎狄”文化的关系研究》，第39页。

⑤ 方素梅：《中国民族思想史上的他者意识及其变化》，刘正寅、扎洛、方素梅主编：《族际认知——文献中的他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322页。

先生《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一书讨论了中国历代王朝的中外关系，其中涉及了中国与其他外部国族及内部边陲族群的互动，分析了各个时期的我者与他者及两者之间的互动。^①

对于秦汉华夏边缘之汉人、塞内“蛮夷”的族群意识的研究，学界亦有零星涉及。如王永平先生注意到了东汉时期江南士人群体（主要为吴地士人）的壮大与崛起，并对其群体意识、地域观念的增强及表现形式进行了探讨。^②王子今先生在分析两汉军队中的“胡骑”时，特别提到了发生在汉朝北边地区的成建制之部队在本族与敌族战争交锋中反复地降来叛走的民族文化现象。王先生认为这表明某些“胡骑”已经成了能够超越族群立场的职业化军人。^③另外，王子今先生近些年来还对秦汉“亡人”群体尤为关注，并就此撰写了系列论文，^④主要探讨了“亡人”的内涵，不同地域“亡人”的组成、活动及其在促进亡入地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作用等问题，也兼而涉及了“越塞”亡入草原地区的中原“亡人”的民族立场、民族情绪等话题。王先生认为该群体

①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年版。

② 王永平：《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27 页。

③ 王子今：《两汉军队中的“胡骑”》，《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④ 王子今：《汉代“亡人”“流民”动向与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进步》，《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 年第 5 期；《论西汉北边“亡人越塞”现象》，纪宗安、汤开建主编：《暨南史学》（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23 页；《略论秦汉时期朝鲜“亡人”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1 期；《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南都学坛》2008 年第 2 期；等等。上述文章后均收录氏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一书。

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他们在民族关系中通常表现出宽和的态度和倾向。

在华夷观念与族群分类、身份及认同的关系上，刘逊先生《我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初探》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古代的传统治边思想，其包括夷夏之防观，以华变夷观及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观。他指出华夷问题不是简单的民族问题亦非简单的边界问题。^① 陈筱芳先生《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主要讨论了春秋时期的华夷关系及华夏族的形成问题。其认为春秋时期总称“蛮夷”的人群可划分为“夷狄部族”（如山戎、赤狄、白狄等）与“夷狄诸侯”（如楚、吴、越等）两个层次，他们同华夏（诸夏）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② 齐春风先生《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主要阐述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重点讨论了传统的“华夷之辨”如何在少数民族统治者那里被改造，“华”、“夷”身份如何在少数民族之间转化等问题。他认为少数民族政权摆脱华夷之辨所带来的思想压力的方法通常是最初强调自己与汉族同源，然后利用华夷之辨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并将与自己敌对的民族和政权称为“蛮夷”。^③ 于逢春先生《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一文研讨了先秦秦汉华夷界限的移动、华夷衍变、司马迁对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与

① 刘逊：《我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初探》，马大正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365页。

② 陈筱芳：《春秋华夷关系以及华夏族的最终形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③ 齐春风：《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他者认同等论题。于先生指出“华夷族群”边界的扩展可以使得部分夷狄族群被化成或自化成华夏族群。^①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战国时代的天下与其下的中国、夏等特别领域》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诸书(如《公羊传》、《谷梁传》、《左传》等)各有各所持有的位于天下之内的特别区域观、外族(夷狄)观以及独自の领土主张。^②笔者亦曾撰文对秦汉不同时期、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进行过考察,指出这两种观念受政治因素影响呈现出阶段性演变的特征。^③

近些年来,伴随着某些领域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以人类学视角与方法研究他者历史逐渐成为一种学术潮流。此种视角与方法的引入亦促使着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边疆史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气象。在这方面众多已发表的学术论著中,具有代表性且与本书论题有着较大关联的主要有王明珂、王铭铭二位先生的相关研究。

在王明珂先生有关华夏边缘的系列研究中,通常采取的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方法。其擅于利用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资料来支撑与论证自己的观点,并主张用一种新的、“边缘”的视角来看待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在他那里,这无疑是一种弥补地方(土著)田野文本材料缺乏的绝好办法。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理论和许多与传统观念相悖的看

① 于逢春:《华夷衍变与大一统思想框架的构筑——以〈史记〉有关记述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

② [日]平势隆郎:《战国时代的天下与其下的中国、夏等特别领域》,甘怀真编:《东亚历史上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台大出版中心2007年版,第53-92页。

③ 朱圣明:《秦汉华夷观念与民族意识研究》,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法,分述如下。

王先生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提出了“民族史边缘研究”理论,他主张族群边缘是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该书在“华夏族群边缘的形成与扩张”部分详述了先秦秦汉华夏族群边缘形成的过程。^① 其《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蛮子、汉人与羌族》两书具体考证了延绵在中国古史中的关于“羌”的认同及其变迁,王先生认为“羌”只是中国人的一种概念,并没有一个“羌民族”在历史中延续。两书均提出了一种所谓“一截骂一截”的族群体系在华夏边缘的存在,并认为古代“华夏”对“蛮夷”的歧视推动着整个“华夏化”过程。但与此同时,王先生又指出这一“华夏化”并不是发生在文化、社会身份迥异的华夏与蛮夷之间,而是发生在文化、习俗、社会身份均相似的人群之间。^② 其《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一文提出了一种反思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在探究本相与表征关系、长程历史观点、边缘研究之理路等方面具有启发作用。该文在方法论上的创新可视为王氏对华夏边缘研究诸种理论的结构概括。^③ 其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中则分析了“中国”之外三种不同的游牧部族构筑的华夏边缘,并通过对不同游牧部族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论述来说明此种不同产生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蛮子、汉人与羌族》，三民书局2003年版。

③ 王明珂：《反思性研究与当代中国民族认同》，《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1期。

这些对我们理解农业社会与不同游牧社会间的交流互动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①其《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一书阐述了“黄帝及炎黄子孙”的祖源记忆如何在地域空间与下层民众中扩散的历史。他提出的“历史心性”、“文类”、“典范历史”等概念对于拓宽与加深族群认同的研究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此外，王先生所关注的炎黄祖源记忆的层次性现象，以及边缘地区的上层祖源不同于下层，如何能够同时成为“华夏”这一问题对我们理解族群的内在关系结构也都是有所帮助的。^②

当然，王氏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亦存有待商榷之处：如近现代的田野调查（如王氏对川西羌人的调查）是否就真能反映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族群生存状态，其他地域社会（如中东和非洲）的民族志材料能否轻易与古代中国北方地带相类比，气候变化及地域环境是否一定决定着古人对于不同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的选择，^③等等。且恰如其所说，古今民族分化融合十分频繁，

① 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② 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③ 钟焄先生曾对王氏《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一书中利用中东和非洲游牧社会的民族志材料来论证中国北方地带的社会结构、对人群与气候环境互动的阐述及其他研究方法、观点存在的纰漏进行过详尽探讨。参阅钟焄：《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265页。笔者亦曾对商周至汉代“羌人”的生存状态进行考察，认为随着与中原政权互动的深入，“羌人”可以突破居地的地域环境及原有的社会结构，结成更高级且较为稳固的社会政治组织。参阅朱圣明：《汉代羌人的社会政治组织与族群认同》，《历史人类学学刊》（香港）第十四卷第一期，2016年4月。

今天的某一族群是否能够代言上古、中古史上原有的或融入他族或已消逝的族群是一个仍需深入思考的问题。另外，王氏为追求边缘人“自己”的声音，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族际多样交流、中原王朝现实举措对边缘族群在生存模式及族群认同上的影响。此已为一些评论者所指出：“（王明珂）华夏边缘研究由于强调族群认同的主导性，对国家或国家权力在华夏边缘形成过程中的主动干预未予讨论”^①；王氏以“族群边缘”探讨民族历史、民族认同的方法对“族群核心”的关注稍显不足。^②在他的研究视域中，华夏“边缘”的历史多少有些被割裂在“中心”之外，兀自独立成一个静止的封闭的时空领域。

即便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王明珂先生对中国古代华夏边缘族群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具体观点上均能给研究者带来极具启发与颠覆意义的思考。对于王氏在理论、视角等方面的创新与高明之处，及其给历史学、人类学研究带来的贡献与反响，众学者已多赞誉，此不再赘述。本书在选题缘起、视角选定上受益于王先生颇多，在某些具体的研究领域（如汉代羌人、蜀人族群认同）还将会与其相关成果、观点进行直接对话。

除王明珂先生边缘研究理论外，王铭铭先生在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时所提出的“三圈说”对本书研究亦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在王先生看来，古代中华帝国视野中的“天下”可分为三个

① 罗丰：《什么是华夏的边缘——读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张云：《民族历史学研究的一股清风——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读后》，周伟洲编：《西北民族论丛》（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8-357页。

部分：核心圈、中间圈、外圈。他指出三者在对研究对象上存在差异：“核心区带研究的实际就是古代中华帝国境内的编户齐民人口；中间区带研究的则是那些编户之外的‘化外之民’，也就是与帝国有远距离接触的那部分人群；最外圈的研究，在唐代宋元时期至为发达的海外诸夷的文献资料中能找到最多印记。”^①王先生认为：“民族史研究或有助于我们理解个别‘中间圈’社会的流变，或有助于我们把握不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史，为我们理解三圈之间的关系结构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倘若民族史研究能与20多年来得到高度发达的历史人类学结合，从单个民族的民族史和不同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民族史转向文化之间‘关系之结构’的历史研究，它便能为我们理解整体中国社会提供重要的洞见。”^②他主张：“为了充分展示‘中间圈’的‘中间性’，在认识方法上，民族研究一方面要克服过去民族史与民族志‘分族写志’的缺点，另一方面更要摒弃西方后现代主义人类学那一简单化的中心—边缘二分法，寻求能够充分反映文明等级上下互动及‘中间式’论述框架。”^③他认为可从两方面理解所谓“关系之结构”：一是站在“土著”的角度看问题，寻找隐匿于“土著”的神话传说、世界观和历史记忆中的对力量强弱不一的文化之间的历史关系的解释；二是注重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状态的形成，重视所谓“文明与野蛮”之间交换的历史。^④

① 王铭铭：《所谓“天下”，所谓“世界观”》，《人类学随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② 王铭铭：《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页。

③ 王铭铭：《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第321页。

④ 王铭铭：《中间圈——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文明史》，第323-324页。

王铭铭先生提醒我们在对“中间圈”族群展开研究时，要避免将“边缘”孤立开来的做法，应关注不同文明等级、不同层次群体间互动的历史，关注不同族群组成的“关系之结构”，关注介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中间状态。这些理论及观点无疑会加深我们对族群互动及其影响的认知。

2. 问题所在

以往学界对古代中国边缘(边疆)地带的研究多集中于中央政府对边缘(边疆)单向的政治控制、军事征服、经济开发、文化教化上，类似研究实际上即在解释、展示或复原王朝国家统治核心如何通过各种措施使边缘与其融为一体的过程。其研究理路忽略了边缘地带及其民众的“主体性”或“自己”的声音。其在“本质上是‘汉化’的阐释模式”。“在这一解释模式下，边缘区的‘人’(土著以及移民)仅仅被视为王朝国家征服与统治的对象，而不是活生生的、与王朝国家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懂得利用政治经济手段与文化策略的、具有历史与生活经验的、有矛盾的心理和情绪的‘人’。站在人类学的立场上，‘汉化’阐释模式完全忽视边缘人群在诸如族群认同、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①

恰如王铭铭先生指出的，“任何历史都有两种意义上的历史的交互作用：一是社会经济的客观史，一是主观的思想史。两者，尤其是后者，对地方历史的演变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②。过往学界对中国古代周边民族、边缘社会的研究多着力于前者，

① 鲁西奇：《“帝国的边缘”与“边缘的帝国”——〈帝国在边缘：早期近代中国的文化、族裔性与边陲〉读后》，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459、461页。

② 王铭铭：《谈历史人类学》，《人类学随谈录》，第163页。

对观念、意识、认同等精神层面的话题则较少涉及。多数民族史著作对中原与周边民族互动历史的阐述都集中在“中原如何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文化方面影响到了周边民族”、“周边民族又如何利用其彪悍的战斗力的侵扰中原甚至入主中原”等问题上。然后,一个看似颠扑不破的结论便产生了:落后民族在军事上征服先进民族的同时,往往又反为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征服。以北部游牧民族为例,美国学者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先生曾指出:“实际上,北部边疆地区的历史常常被简单化地缩减为相互征服史的陈述,这种征服是在代表两种相反原则的民族之间进行的。”^①

可喜的是,这些年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其中,尤以人类学研究方法及视角的引入给民族史研究带来的革新最为显著。有学者指出,“就民族史研究领域而言,人类学的理论修养在提升研究者的洞察力与开阔他们的研究视角诸方面贡献良多”^②。人类学化的历史学或称历史人类学“从边缘地带”提出解释视角^③,这与以往传统民族史研究从中心看边缘,以中心(汉人社会)为本位,关注民族关系史、汉文化的播迁轨迹与过程显然是大相径庭的。此种从主位的角度研究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方法,^④充分考虑到了边缘及边缘

① [美]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② 钟焄:《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第264页。

③ [瑞士]雅各布·坦纳著,白锡堃译:《历史人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④ 乔健:《略谈研究中国民族史方法论上的两个问题》,《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人群的能动性,其所关注与研究的乃是“本土”或“土著”的历史。由于重视主体存在,类似研究能让研究者获取很多中心视角下所观察不到或为之忽略的具有特殊“意义”且体现边缘群体诉求的现象,也会让人对某些平常性的历史事件产生新的理解,促使人们对历史有着更加完整的认识。其对于深化民族史研究,特别是边缘族群身份与认同的研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然而,学者在将人类学理论引入民族史研究中,对传统民族史或“典范历史”进行反思乃至解构时,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的现象。其突出地表现在为讲求边缘视角、主位研究方法,过于忽略或低估来自华夏中心的干预作用。这种超然于“中心”之外谈“边缘”的做法,很容易促使民族(族群)史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瑞士学者雅各布·坦纳(Jakob Tanner)曾指出:“要想采取非民族中心论的认识方式,那首先就必须去掉中心,就是说要着眼于进行并且容许多种解释。”^①然“中心”何在?又何能摆脱“中心”?首先,族群产生于互动之中,正是由于与“中心”或“次中心”的互动,边缘族群作为一个“群体”才得以体现,其族群意识才得以生成与凸显。若完全抛弃“中心”,我们可能无法确切地理解边缘族群的产生、存续及其认同的变迁。其次,“边缘”与“中心”并非能够完全割裂,来自“中心”的话语、权力、利益对“边缘”的影响一直显性或隐性地存在着。最后,“中心”与“边缘”、我者与他者的互动经常发生,那种机械去掉“中心”谈“边缘”的做法固然能够得到“新知”,但其绝非是完整的、充分考虑到各方存在作用的认知。

诚然,边缘本位视角下的确可以看到很多“中心”看“边缘”

^① [瑞士]雅各布·坦纳著,白锡堃译:《历史人类学导论》,第161页。

所观察不到的景象,然边缘在此,很大程度上也将人的眼光限定或束缚在某一视域、标准与原则之下。研究者可能会因此而忽视不同族群在历史中的互动,以及“边缘”对“中心”亦存在的“认同感”与对“中心”话语的运用。所以,我们对边缘的关切不应仅体现在主位视角上,还应重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正如前引王铭铭先生所指出的,要摆脱那种简单的中心、边缘两分,将边缘及边缘族群孤立“在‘中心’之外的做法,而应多关注‘边缘’与‘中心’的互动,以及边缘人群如何利用各种资源和话语在互动中确立自身在帝国以及‘天下’内的身份与认同。笔者认为以边缘主位视角探究不同人群间的互动历史,不仅能使我们更为深入地研究边缘社会及其人群,还可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同族群间的关系、社会结构、历史演进路径开辟新途。

以上是对整个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中存在的某些问题的讨论。具体到当前学界对秦汉周边族群、边缘社会的研究,上述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当然,受秦汉华夏边缘历史上本土文本的缺乏及现实中“田野”的时过境迁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学者利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展开对其时华夏边缘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刘志伟先生认为:“如果国家的建造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①这一从明清史领域提炼出来的研究边缘地方社会的经验、方法或视角能否借鉴于明清之前时段,需要研究者进行具体的实践、论证与分析。然正如鲁西奇先生指出的,此种围绕地方社会与国

^①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家互动、重视王朝统治下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参与”的阐述理路，“迄今为止主要运用于明清史的研究领域，它是否可以运用于秦汉以至宋元时期，因为尚未见有这种尝试，尚不能做出明确回答”^①。换言之，秦汉地方社会的土著人群及其精英是否也有着“一套自己的方法去运用帝国的话语和隐喻，以确定他们在地方社会乃至帝国体系中的身份”还不得而知^②。

二、研究思路与篇章安排

1. 研究思路

本书将沿着前贤所开辟的道路，借鉴人类学的方法论，特别是其主位研究法（研究视角）与文本解析方法展开对秦汉华夏边缘族群的研究。人类学以研究对象自身为主位的做法能带给历史学在研究理论及方法上的革新，此已前述。而人类学家对待文本的态度及解析文本的方式亦在推动历史学研究向纵深、多面发展上贡献良多。杜靖先生指出在对待档案与文本上，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档案和文本的真实、文字本身负荷的信息，历史人类学则关注档案记录和文本撰写等的系列行为、过程及场景；历史学较多关注档案和文本撰述者个体的心态，而历史人类学则视档案和文本为特定人群的集体表象，而只是假撰述者个人表

① 鲁西奇：《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周宁主编：《人文国际》（第二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② 鲁西奇：《多元、统一的中华帝国是如何可能的？》，第13页。

述出来而已。^①显然,在对群体的族群意识、精神认同等层面的研究上,人类学的文本解析方法会促使研究更加真切与丰满。

本书引入人类学相关理论来研究秦汉华夏边缘族群,存在两个亟须解决的问题。首先便是本土文献的缺乏。秦汉时期的边疆族群并没有多少自身的文献留下。基于此,本书在尽量利用所研究对象的本土文本(如《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越绝书》等传世文献,简牍、碑刻等出土文献)之外,将尝试对“客位”视角下的传统民族志材料进行重新挖掘与解读。事实上,对传统民族志进行更新改造,亦能促使“人类学研究方法从单一的田野调查中解脱出来,走进了历史的‘田野’之中”^②。我们认为传统民族志中有关边缘族群话语、行为的材料并不能决然因为“华夏”主位视角的存在而弃之不用。这部分材料亦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有些话语、行为没有也不需要去刻意“污化”、“夸饰”与“扭曲”,其是客观存在或发生过的),只要解析得当,我们也可从中获得所需要的边缘族群的信息。而且,边缘主位视角下,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为以往“中心”视角下的研究所忽略的材料及其内涵。此种因视角转换而带来的史料的“丰富”亦能促使我们获得新知。由上,本书将在综合运用本土文献及传统民族志材料的基础上,对边缘人群的话语、行为等进行一种“人类学式”的解读,以图挖掘其背后之内涵与意味。

接下来的问题是,秦汉时期无论边疆本土文本还是华夏视

① 杜靖:《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档案与文本》,《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② 刘海涛:《西方人类学“历史化”的动因分析——以美国“民族历史学”的影响为中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